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转型原因探微

——兼论张恨水文学史独立价值的确立

石 娟

杨义先生曾说过：“张恨水是最具过程感的作家之一。”要反观中国现代文学沉重的历史进程，张恨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在张恨水的文学世界中，没有对既成事实的信仰与追随，只有不断的自我否定与尝试，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以一个独行者的姿态，继承传统又批判传统，肯定现代又指责现代。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不断流变的形态，虽然在创作生命的每段历程中流变幅度的大小不一，但正是这些或明亮或黯淡的流变轨迹，成就了张恨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可以说，“变”是贯穿于张恨水全部小说的惟一不变的特征。也正基于此，促使这“变”发生的内驱力和外在动因成为张恨水研究中颇有争议的论题。因为，基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批评视角、参照物以及立场的选择都将涉及张恨水小说自身独立价值如何确立这一根本性论题，甚至会引申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一系列问题的质疑和反思。（1）张恨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在于他不仅仅是独立于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之外的一道特殊的景观，（2）也不仅仅是融会传统与现代、雅与俗、新与旧的集大成者，更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突破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一直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以及一贯以新文学的关键词如宏大叙事、主流意识形态、革命、国家、严肃等为评价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的话语权主宰的思维习惯的一个参照物、一个案例，为我们拓展了一个近乎无人探询的历史空间——一个“张恨水式”的文学的第三维空间，透过它，张恨水将不会再有“先造好房子才去找地皮的尴尬”，（3）也不会再为是否与鲁迅是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两座高峰而烦恼，他会心平气和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于是，在这里，笔者尝试从张恨水自身出发寻找其创作转型的原因。

一

综观张恨水小说创作的流变形态，其作品至抗战时期的变化较为突出，也备受研究者关注。然而，关于“抗战时期”，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给出确切的起止时间，尤其是起始时间，学界并没有一个定论。因此，要探讨张恨水抗战时期作品特征、形态以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关于“抗战时期”时间的界定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论题。笔者以为，这一时间的界定，除了要依据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特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张恨水本人的创作特点来进行探讨，这由文学史自身的本质特征所决定。所以，笔者较同意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视为张恨水“抗战时期”作品的起始时间，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思考：第一，就张恨水作品的题材而言，1931年，应上海《新闻报》主编严独鹤之邀，《太平花》开始创作，在创作过程中，第一次将抗战题材纳入小说内容——“‘九·一八’国难来了，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罢，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4）之后的一系列创作多与抗战题材密切相关。第二，1931年底到1932年初，张恨水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弯弓集》，取“弯弓射日”之意。在其序中写道：今国难当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无人所可否认者也。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必求其无孔不入，更又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供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5）

可见，作家此时已经自觉地将国家、民族的救亡放在自己文学创作的首要位置，“必求其无孔不入”。时至1933年6月钱杏邨（阿英）指责张恨水为“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弯弓集》是“投抗日之机”；迫于外在的压力，“不得不做‘国难小说’”；“如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胡话’”。（6）这些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主观甚至刻薄的批评，矛头均指向张恨水以《弯弓集》为代表的一系列抗战作品。如果以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为其抗战作品的起始时间，那么之前的一系列以抗战为题材的创作以及一系列关于张恨水抗战作品的批评则显得无所适从。综上，笔者以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应该为张恨水抗战时期作品的起始时间较为合适，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是张恨水抗战作品创作密度较大的时期（之所以用“密度”而不用“高峰”或“鼎盛”之类的字眼，是因为张恨水此时的抗战作品呈现出以量取胜的特质），作者的抗战激情成为此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创作动机，使得“图解”、“粗放”成为此时部分抗战作品的最显著的弱点。到1939年《八十一梦》发表前后，可以看作作家抗战作品的成熟期，因为这一阶段张恨水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如《魍魉世界》《水浒新传》以及直到抗战胜利后以抗战为题材的《五子登科》《纸醉金迷》《巴山夜雨》等，较上一时期更注重战争对人性摧残的深度挖掘，笔触更深沉，更厚重，更具有反思的特质。至此，张恨水的抗战作品的起止时间初步厘清，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张恨水抗战作品转型原因展开论述。

二

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创作形态的转型可大致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为题材的转型——抗战题材开始成为小说内容的主要元素；二为创作观的转型——从“梦幻浪漫主义”到“恶梦现实主义”。（7）这两方面转型的原因我们分别予以探讨。

（一）在小说创作中纳入抗战题材的原因

关于张恨水抗战时期创作题材转型的原因，多数观点认为是作家主观受新文学的影响较深（接受影响的原因目前主流意见主要有两类，一为自愿完全接受，二为被迫），此时的张恨水创作意识和小说主题与新文学越走越近，以致达成共识，“由消遣文学走到了听将令文学”，“被新文学招安到帐下”，而获得了新文学的肯定。（8）还有一部分观点认为是由于以钱杏邨为代表的新文学的批判给张恨水带来了压力，“逼迫”张恨水“进行再调整，进一步向‘抗战’主流规范靠拢”，“其深层‘动力’来自五四新文学对他一贯的充满了鄙视性的打压姿态”，张恨水的“靠拢”，“充满了无奈”。（9）但是，正如前文所说，这些观点都是以新文学为参照物，确立新文学主导地位的前提而得出的结论，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尽管历史事实不能假设，但这仍然是一种已经被普遍肯定并借用到史学以及哲学中的逻辑学上的论证方法），假如新文学没有发生，或者退一步而言，假如新文学没有在与20世纪通俗小说的厮杀中取得文坛的话语权，抗战如期而至，以张恨水气质性格以及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节和家国观念，他会不会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他会不会创作“抗战小说”，以期“唤醒国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张恨水“不屈不挠”，“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10）既然这个结论是肯定的，那么构成这个确定命题的假设就是成立的，那么，与这个假设完全相异的命题是否可以作为前提而导出的结论便开始让人怀疑。也就是说，先验地将新文学置于不容否认的地位并以此作为思考张恨水创作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当然包括转型原因的探讨）的方法是值得质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情怀，是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由于平昔受中国固有道德的陶冶多读线装书的润育”，（11）对淡薄名利的名士的追求，使得张恨水具有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情结。于是，“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和“寇氛日深，民无死所”的社会现状，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国家情怀的张恨水“心如火焚”，感到自己“百无一用”，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感，使他在文风和写作上都来了一个大转变，他曾自述：“我的写作意识，转变了个方向，我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12）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新文学的批评、指责甚至“逼迫”，“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恨水也必然将抗战题材纳入小说创作。

同时，作为一位报人小说家，自由的报人意识，必然影响到张恨水的小说创作观，影响到张恨水对当时文学界主流话语的态度。从张恨水以各种笔名发表于报端的厚厚的杂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在发生任何重大政治或历史事件之时，他都以一位自由批评者的身份，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来批评政治中的得与失，即使生命受到威胁。对于一个“最重气节”“最爱惜羽毛”的自由报人，甘冒生命危险为文指斥政府大员各种丑恶嘴脸而在所不辞，会仅仅为了新文学家们不屑一顾的傲慢和充满偏激情绪的批判便去讨好新文学，取得它的认同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品格吗？何况，张恨水创作抗战小说的理念是“在抗战言情上兼而有之”，属于软性抗战小说，与新文学对战争的宏大叙事风格完全迥异。因此，将抗战题材纳入自己的小说元素，是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形势下，作家将自己的私人情感让渡于中国知识分子国家情结的自觉行为，而非完全单纯迫于新文学不公的指摘。

（二）从“梦幻浪漫主义”向“恶梦现实主义”转型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有人提出“开发西北以资补救”的主张。然而具体如何开发，怎样补救？带着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1934年5月18日，张恨水带了一名工友，由北平出发，前往西北，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西北游，目的是“求得一个认识”。然而，饿殍遍地、赤地千里的景象以及天灾人祸给大西北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令张恨水十分震惊，因而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于是，西北游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系列作品——《雁归来》《小西天》《艺术之宫》《现代青年》《秦淮世家》《美人恩》《夜深沉》，等等。尽管从题材上看，这一类作品似乎毫无关系，但略一留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作品的内里有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作者关注的目光开始投向底层，通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及下层民众所经历的苦难反映作家的问题意识——对人性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衷心钦佩于作家视角的敏锐和选题的超前意识——时至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这些问题仍弥漫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带有典型意义，如《艺术之宫》中人们对裸体模特的态度、《现代青年》中父慈子不孝的现实、《满江红》中歌女的生存状况以及《美人恩》中小市民特有的自私、虚荣、冷漠……这一类现实主义作品，构成了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又一道壮丽的景观。张恨水前期的作品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由于其“言情为经，社会为纬”（13）的叙事结构和重于言情的叙事策略，使得这些作品具有了梦幻色彩的浪漫主义风格，（14）而1934年之后的一系列作品，无论题材、结构、语言还是谋篇布局，都着实体现了作者迈向“恶梦”现实主义的努力——着重于写下层民众的苦难以及描绘社会的群丑、阴暗面，至《八十一梦》以及抗战后的《纸醉金迷》《巴山夜雨》，批判的笔锋则更为犀利，揭露得更为淋漓。那么，是什么动力驱使张恨水使他的小说“从遥远的过程，迂徐而踏实地，向现实主义道路”（15）迈进的呢？

张恨水曾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过，五四运动让他“受着很大的刺激”，于是，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的小说成为“现代事物”。张恨水于1918年开始寄身翰墨，可以说，关注现实，是张恨水一踏上文坛就矢志不移的文学理念，对于这样一位以现实为创作蓝本的忧国忧民的全能报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由于记者职业特点而对社会的近距离接触，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作者对社会的认识的逐步深入，可以说，步入“恶梦现实主义”创作终会成为一种必然。

同时，作为一名记者，张恨水深谙“用事实说话”这一新闻记者的行业规范。西北行之前，张恨水同郝耕仁曾学习老残，为了“好好考察中国的国情”，一边卖药，一边游历，尽管由于军阀混战，他们的行程到了邵伯镇就被迫结束，但作家这种通过实践得出结论的思想基础已经形成。所以，西北行后，作家说自己的思想完全变了，而文字也完全变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叙述这段思想历程的时候，张恨水完全没有提及新文学的影响，反倒是《小西天》在上海《申报》发表时，编者周瘦鹃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现在一般作家，都高喊口号，到民间去。是的，我们很赞成作家到民间去，替民间写些东西出来。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到民间去的作家，能有几人？甚至于口里喊着到民间去，人却在高大的洋房子里。而咖啡馆、跑狗场、百乐门跳舞厅，大光明电影院，……这是他们不时光顾的所在，也许这里就是民间。”（16）

很明显，对新文学空喊“到民间去”的口号，却少付诸行动的做法，周瘦鹃是不赞同的。无独有偶，1944年，已经和新文学结成统一战线的张恨水，通过自己的调查，依然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大都会的儿女，不但没有看见过赶场的书籍，我相信连书名都很陌生。在这种情形下，坐在象牙塔里的文人，大喊到民间去，那简直是做梦。我们要知道，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五十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些人越摔在后面。任何‘普罗’文艺，那都是高调，而且决对是作者自抬身价，未曾和这些人着想，也未曾梦到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17）

可见，张恨水对新文学空谈理论而不重实践的行为是颇有微词的，尽管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新文学矛头所指，甚至新文学对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采取了积极的接纳的态度，然而，忠于“用事实说话”记者信条的张恨水同样以诤友的姿态从旁观的立场给予新文学客观而直接的批评，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西北行的所见所感是张恨水从“梦幻浪漫主义”到“恶梦现实主义”转型的最主要原因，而非新文学的拉拢、肯定甚至无与伦比的宏大叙事影响所致。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们探讨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转型原因，尝试从作家自身——他的性格、气质、经历以及思维方式几方面寻找原因，而没有将新文学作为一个先验的参照物来思考这一问题，目的就是要凸显张恨水自身的独立性特征，因为只有肯定了他的独立存在——文本的独立性，作家气质性格的独立性，作家“刚直不阿”“不随波逐流”，善于独立思考、探索发现的诸多与众不同之处，方能显出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立价值所在。而这种独立，并非是脱离了一切外在影响而自发形成，并非是孤立，而是一种主体不曾弥散的理性探索。也就是说，本文并无意否定新文学对张恨水创作转型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仅仅将‘影响’狭义地理解为‘模仿’、‘跟随’、‘受指导’，同时也包括‘刺激’、‘干扰’、‘制约’、‘对话’、‘挑战’等因素”，只是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这里不再展开。在这个概念的指引下，我们将可以拓展出更多可供思考的空间。

注 释：

（1）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研究所赵孝萱教授在他的《“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一书中以张恨水在现代文学史上难以定位的问题，探讨了现代文学史观的偏差，指出，“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非新文学文本，长久以来却一直处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边陲，受到忽视与误解。误解之因，是当时新文学家掌握发言的优势，他们所有对‘非我族类’的论战文字，至今为研究者奉为圭臬，大量引用。当然更根源的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单一史观的问题。”

（2）见杨义.文学奇观和文学史困惑[A].张恨水名作欣赏[C].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页。

（3）关于“抗战时期”起始时间的界定，目前有几种观点：（一）张友鸾先生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中将张恨水的作品分为四期，认为张恨水“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并将张恨水抗战时期的作品列为三期。（二）孔庆东先生则在《通俗文学十五讲》中的第六讲《打通雅俗的张恨水》中认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恨水的创作跃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三）袁进先生在《试论张恨水抗战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及意义》中认为 “抗战时期，是张恨水文学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他在三十年代开始的接受新文学影响改变创作趋势的势头继续发展”。张光亚先生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张恨水的文学观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达到了一生的最高境界”。蔡传桂先生也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张恨水的创作倾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秦弓先生认为“‘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成为他（张恨水）以及一批被视为旧派的作家的小说创作转变的契机。”这里将袁进先生界定的“三十年代开始”视为“九·一八”事变前后。

（4）见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5）张恨水《〈弯弓集〉自序》。见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0-261页。

（6）见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见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3-300页。

（7）[英国]T.M.麦克莱伦（马轲蓝）博士，曹多胜译，徐传礼校。《从梦幻浪漫主义到恶梦现实主义——张恨水小说中的变化和延续》。马轲蓝博士认为，张恨水文学的基本模式，“带有民间传说意味的为大众所喜爱的传统型文学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是熟识的、浪漫的，总之具有安慰性的现世的表演。张恨水所处的‘五四’时代‘进步’作家所欢迎的文学模式现代特色的中心是现实主义”，“他最成功的‘现代化’大都存在于对中国传统小说模式的改良之中”，即从“梦幻浪漫主义”改变为“恶梦现实主义”。笔者借用这一说法来概括张恨水抗战时期作品转型的另一形态。见张恨水研究会编《张恨水研究论文集（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第146-167页。

（8）见孔庆东《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年5月，第207-216页。

（9）见温奉桥《“现代性”规范的调整——张恨水“抗战小说”新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41-45页。

（10）老舍《一点点认识》，见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10-111页。

（11）罗成烈《我所认识的恨老》。见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11-112页。

（12）见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132页。

（13）张恨水本人于1944年5月16日发表的《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中说：“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多试一试。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见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79-281页。而不少学者通过对他这一时期作品的实际考察，则认为“从他作品结构方式来看，则发现大多数是以‘言情为经，社会为纬’的。”见董康成《在历史的坐标上——关于张恨水及其创作的总体思考》，《张恨水研究论文集（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4页。“揆诸作品实际——如前文所列举——恰恰是‘言情为径，社会为纬者’多。”见白盾，程景林《张恨水是“言情小说”大家》，《张恨水研究论文集（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第71页。芮立祥先生在《论〈燕归来〉审美视点的转换》（《张恨水研究论文集（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第245页）一文中持赞同态度，笔者也赞同这种说法。

（14）T.M. 麦克莱伦（马轲蓝）博士在他的《从梦幻浪漫主义到恶梦现实主义》中，认为张恨水前期的作品“从整体风格上说尚存有‘如梦’色彩” 称此时期的作品是“具有安慰性的传统双极律结构”，体现出“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以杨杏园为代表的怀旧性的忧郁的浪漫主义，浸透了梦幻色彩”。

（15）《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周年》，见重庆《新民报》，1944-05-16。转引自张伍《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240页。

（16）转引自袁进《小说奇才张恨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第119-120页。

（17）张恨水《赶场的文章》。见重庆《新民报》1944-04-11。转引自袁进《张恨水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参考文献：

[1]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1.

[2]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10.

[3]杨义，张恨水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10.

[4]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5]张恨水研究会编，张恨水研究论文集（一）[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5.

[6]张恨水研究会编，张恨水研究论文集（二）[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6.

[7]孔庆东，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5）：207-216.

[8]温奉桥.“现代性”规范的调整——张恨水“抗战小说”新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41-45.

[9]袁进.小说奇才张恨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

[10]许子东.呐喊与流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0.

**作者简介：石娟，女，文学博士，苏州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